

潮州窯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叢書

筆架山

SONG DAI BI JIA SHAN CHAO ZHOU YAO

李炳炎 編著

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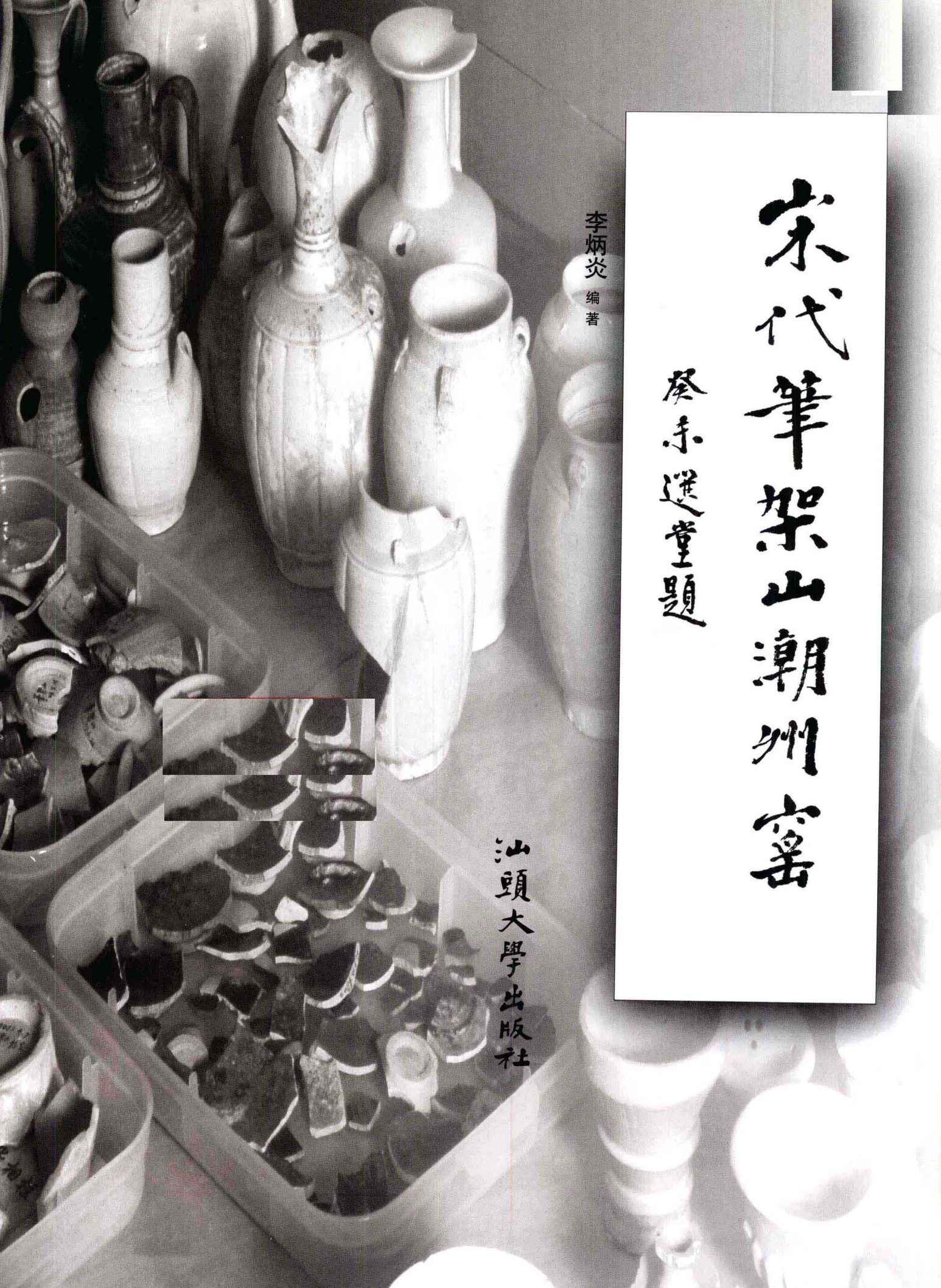
汕頭大學出版社

宋代筆架山潮州窯

蔡永選堂題

李炳炎
編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 / 李炳炎编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81036-768-4

I . 宋... II . 李... III . 民窑—简介—潮州市 IV . K87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0207号

宋 代 笔 架 山 潮 州 窑

编 著: 李炳炎

责任编辑: 胡开祥 黄小尤

设计制作: 水木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大16开 印 张: 7.5

字 数: 50千字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定 价: 120.00 元

ISBN 7-81036-768-4/K · 31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序 黄挺	1
潮州宋瓷小记 饶宗颐	6
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分析研究 曾广亿	10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概况 李炳炎	24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青花瓷器——佛像 李炳炎	31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残青白釉点彩双狮戏球枕 李炳炎	34
图版	36
壶	36
瓶	46
碗	49
盏	56
盘	60
碟	65
杯	71
盒	73
罐	75
灯	78
炉	82
像	94
玩具	106
杂件	109
后记	114



序

黄挺

1922年10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冈地方，军队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1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石室中藏着四尊青花白瓷佛像，还有一个满雕莲花瓣的瓷香炉。佛像极精美，尤其可贵的是，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从铭文中我们知道，这四尊佛像是北宋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和熙宁二年（1069），一位手工艺精良的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些瓷器出土后，被转买于私家收藏，鲜为世人所知。后来由罗原觉（道在瓦斋）撰写的《谈瓷别录》，在《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加以披露。

1940年，一个名叫麦康（Malcolm F. Ferly）的西方人，亲自到福建、广东做了考古学调查之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专门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地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¹。这篇文章发表后，大概在国内甚少人读过²，笔架山窑也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3年到1954年，韩山师范学校和它的附属小学在笔架山中段兴建校舍的过程，陆续发现4条龙窑。广东省文管会派员前来勘查，并采集了一批标本。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刊登文章，对笔架山窑址做了报道：“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濶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1.50公尺，砖破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粘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³

第一个让学术界真正关注起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是著名的潮籍学者饶宗颐先生。

1955年，先生所著《潮瓷说略》，由长谷部乐尔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二四上⁴。这篇文章的重点，在



介绍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文章第一次把羊皮冈出土的瓷器同F·Ferly对笔架山窑的考察成果联系起来。从潮州瓷土矿的蕴藏情况、潮州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谈起,根据出土佛像座上的铭文,推断这些造像就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然后利用这些造像和F·Ferly的文章提供的笔架山窑瓷片的胎质、釉色,与中国其他名窑做比较,肯定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⁵。文章发表后,屡屡为学者们引用⁶。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

1954年和1956年,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专家到潮州对古瓷窑址进行调查。

陶瓷专家陈万里到广东文管会看了羊皮冈出土的瓷造像,并赴潮州实地调查之后,发表了《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一文,证实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存在,考证了水东中窑的位置,同时对在窑址收集的瓷片,按釉色分类,做了比F·Ferly更为细致的描写。陈万里说:“将来如能有一个正式发掘韩山古窑的机会,当能获得更具体的材料,那是一定可以预料到的。”⁷

这两次调查的另一个成果,李辉柄的《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直到1979年才在《考古》杂志第5期上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对采集到的300多片瓷片,进行科学的整理,并利用瓷片复原出完整器,分成碗、盘、杯、壶、罐、盒、炉7大类加以描述,总结笔架山潮州窑的器形和纹饰的特点。

笔架山潮州窑的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1958年。发掘都是伴随着基建工程进行的,带有抢救性质。1958年,广东省博物馆在笔架山北段和南段,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一号、二号、三号窑。1974年,广东省文化局主办的省考古训练班在笔架山中段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四号、五号、六号窑。1981年,这6座瓷窑发掘报告才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这就是署名广东省博物馆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

《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综述了一至六号窑的清理过程和成果,重点在窑址和出土遗物。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实物资料,《发掘报告》对笔架山窑产品的胎质、釉色、器形及纹饰能够做出更详细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次发掘中出土的未经前人报道的器物,包括人像、佛像、动物玩具,还有大量的完整器和基本完整器。其中,如军持、洋人像、西洋狗一类产品,引发了学术界对宋代潮州窑外销瓷器的研究兴趣。同时,《发掘报告》也介绍了笔架山临近的其他唐宋潮州窑,以及1922年出土的瓷佛像、莲花炉和潮安县文化馆采集的笔架山瓷器,让人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1982年,饶宗颐先生又作《潮州宋瓷小记》一文,讨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根据此前20多年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旧作《潮瓷说略》略加发挥。这篇文章最可注意一节,是引据《韩山许氏族谱》,论说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衰落的原因。其中也提出造佛像的刘姓窑工,当是笔架山后桃坑刘氏族人的猜想。1989年,饶先生对此猜想复加申述,把宋代潮州窑集中于笔架山,同附近瓷土的出产与刘姓巨族的聚居联系起来⁸。这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

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文化局,配合韩山师专理化楼的基建,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山坡,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七号、八号、九号窑。这次清理发掘的报告,由黄玉质、杨少祥执笔,以《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为题,发表在1983年《考古》杂志第6期上⁹。这次发掘出土大量比较完整的器物,其中有此前未发现的矮身壶和短流小把壶等器形,而最大的收获是,八号窑出土一件有铭文的佛像座,纪年治平三年(1066),同样是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个佛像座使水东中窑即在笔架山中部的论断,获得确证。



报告提出笔架山窑的经营“可能是几家组成作坊生产”的看法，同样可以启发思路。

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和潮州市博物馆，在笔架山中部庄厝山又发掘了一座龙窑，编号为十号窑。这是一座巨型瓷窑，分18段窑床，残长就达79.5米，国内罕见。在窑中出土一批日用瓷器，和大量烧窑用的匣钵。这次发掘还没有正式报告发表，现在只能读到当年的发掘报道和对这座窑的简单介绍¹⁰。

以上是我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从已经清理发掘的成果看，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规模大，产量巨；产品形式多样，呈现多个名窑口的风格，又精粗不一；产品大量外销海外，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研究的古瓷窑。但是，由于这个窑口被人关注的时间比较晚，清理发掘的成果分散披露，实物被几个博物馆分别收藏，发掘报告的图版印制质量不高，都对进一步研究非常不利。

正因为如此，李炳炎先生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书出版，对研究者，对收藏爱好者，都不能不说是一大福音。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共收录了230件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的图片。这些图录，倚赖三个来源的实物拍摄而成：一是李炳炎先生自己的收藏110件，占48%；一是收藏界友好所藏60件，占26%；一是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博物馆的藏品60件，占26%。

这三个来源的实物，其实最终只有两种出处：出土和出水。

博物馆的藏品，大部分是历次发掘所得，即出土物。其余采集自民间，本来也是私家藏品。民间私藏，也有出土物，但其出土地点，往往不能确知。另外一类，是出水物。所谓出水，是指器物从河道海底打捞得到。近20年来，潮汕一带，建筑业发展，对河沙需求量大，韩江下游于是有抽沙业兴起。抽

上岸来的河沙中，时常杂有瓷器、瓷片。这些器物，流入冷摊、坊间，最后多数是落到收藏者手里。而这些从韩江出水的瓷器，大多又是潮州本地古代窑口的产品。

收藏界历来有做假的风气。近年，热衷收藏的人数骤增，市场需求量大，做假之风也越煽越烈。民间收藏出土瓷器，多有做假者。出水瓷器，因为可以不为窑口地点所囿，容易遮人耳目，市面假货更多。因此，《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图录，首先面临着一个判断真假的问题。

真假之外，还有判断是非的问题。过去，博物馆和收藏界，更多把眼光放在几个著名的官窑器上，研究多，也研究得透。在中国漫长历史时期，出现过的众多民窑。相对而言，这些民窑甚少被认真研究过。这些窑口在什么时候出现和衰落？它们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各有什么特征？大都还很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一件器物属于哪个时代、哪个窑口，实在很容易弄错。例如，同是潮州窑的瓷器，是不是宋代的？是不是笔架山窑的？鉴别必须十分谨慎。这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图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我和李炳炎先生讨论过这两个问题。炳炎先生说，入选《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图录的，除了博物馆的藏品以外，凡民间的藏品，根据两个原则挑选。第一个原则，出水器物的出水地点，尽量限于潮州城南门外韩江夏寺河段。第二个原则，出水及出土地点不明的收藏品，都应该以有明确出土地点，即博物馆收藏历次清理发掘所得的器物为依据予以鉴定。

我认为采用这样两个原则还是颇为慎重的。

厦寺河段，在笔架山下约3公里处。这里与笔架山宋窑距离甚近。北宋，潮州城东南韩江西岸一带，是一个商贸港口。厦寺河段正好就在这一地带。而到南宋，从厦寺河段下游分叉的古彩塘溪，还是



韩江出海的重要航道之一¹¹。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应该有从这一河段装船出海的。这段河中有笔架山窑遗物，也在情理之中。

1998年秋天，潮州市南春中学一教师就曾经在这一河段的沙滩上拾到一个四面刻有铭文的佛像座残器，胎质灰白，青白釉，与1922年羊皮岗出土四尊佛像和1980年笔架山中部八号窑出土佛像座，同出匠人周明之手。断定这件出水器物是宋代笔架山窑的产品，应该是无争议的。但是，这件器物是专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制作的，不属外销产品，大概是在毁损之后，弃于河中。而竟然在近千年后，在距窑址数里之外出水。这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从这一河段打捞出水的笔架山宋窑器物，比传出韩江凤凰洲下游其他抽沙点者，较为可靠。

至于用出土地点明确的器物为依据进行鉴别，主要倚重两种方法：

1、胎质的鉴别。一般说，原料构成和制作工艺（主要是瓷土淘练、瓷窑结构与火候掌握），必然造成某一窑口产品的胎质特点。炳炎先生通过对大量出土瓷片的深度观察，总结出笔架山宋窑瓷器胎质的特点，认为：宋代笔架山窑瓷器的胎体，在高倍放大镜下，都可以观察到极微小的粉白色或灰白色的斑点，“这种带有粉白色或灰白色斑点的胎土特征是鉴定笔架山窑瓷器的重要依据”。从深度观察中总结出的这种特点，在出土有据的完整器上得到证实以后，就可以推而广之，据以验证出水及出土地点不明的收藏品了。

2、依据瓷片以鉴定残器或完整器。上面所讲的胎质鉴别方法，其实也是先通过瓷片立根基，再鉴定残器或完整器。除了验胎质之外，熟玩瓷片，对本窑的工艺手法，如制作手法、纹样特征等等了然于心，再依据这得自碎片观察的心得，对残器或完整器做综合鉴定，虽不能说万无一失，却可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判断。举两个例子。

例一：炳炎先生收藏有一件双狮戏球枕，是出水器。这件器物虽已残破，其制作工艺精良，造型生动，仍然可以从残件看出。瓷枕釉色，影青泛白，在宋代笔架山窑产品中最常见。但是，在此前出土和采集的笔架山窑器物中，未曾出现过这种器型。如何确定这件器物就是宋代笔架山窑的产品呢？用笔架山宋窑出土的瓷片、残器作比较：①羊皮岗出土的4尊佛像，头发、眉、瞳、胡须都用青料描点¹²；笔架山宋窑出土的风首壶残片，凤髻眉眼也用青料描点。此种青料烧制之后，在釉下呈青褐色，露釉处呈酱黑色。双狮戏球枕，在狮子的眉、鼻、嘴、髯、尾等处，应该也描点了青料，因此釉彩呈现深褐带青的色泽，与凤首壶残件比较，完全相同。②狮子的眉毛，是另捏后贴的，造型为略上翘的弧形，两端卷成圆形，划直线纹。用出土的一件凤首壶残片比较，凤眉的造型和划纹，手法完全相同。③狮子的身体，用旋毛形的篾纹装饰，手法似用并排尖齿工具，一次划成。笔架山窑出土的盘碗残片，常见这种装饰手法。④狮枕的底座印有麻布纹，与笔架山窑出土的鲤鱼壶残器的底座一样。通过几个方面的比较，大致可以断定这件双狮戏球枕是笔架山宋窑的产品。

例二：炳炎先生收藏的影青瓷碗，有施釉及足和施釉包足的，也是出水器。因为笔架山已经清理10条窑址出土的瓷碗，都施釉不及足，所以不敢遽定是笔架山窑的产品，尽管其器形、胎质、釉色、纹饰都与笔架山窑器逼近。2000年8月，笔架山中部山麓的韩山师范学院医务所旧房拆迁，地表下发现废弃瓷片堆积，其中碗足碎片，间有釉及足和釉包足的。得到这些瓷片的支持，先前有疑问的瓷碗，也可以断定是笔架山窑的产品了。

附带提起，这些瓷碗也可能引起笔架山窑生产持续时间的再讨论。

笔架山窑的断代，本来有不同的看法。饶宗颐



先生根据山前山后的人文地理，以及《韩山许氏族谱》，推测为两宋。广东省博物馆编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根据窑址的出土物，断定是北宋。李辉柄先生则说应该为北宋到元代，他的理由是“在遗址中也拾到一些晚于宋代的遗物，一般胎体较为厚重，无纹饰，制作较粗，最明显是一种折沿盘，沿口向上卷起，盘里浅刻象征性的菊瓣纹一周。这种盘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在浙江龙泉窑中也是最常见”¹³。

由于韩山师范学院医务所旧房拆迁工地未发现窑址，而施釉包足的碎碗片只是从窑址废弃物堆积中发现，如果我们认同施釉满足的工艺到元代才普遍在民窑的生产中使用的观点，那么，笔架山是否还如李辉柄先生所推测的那样，存在到元代仍然继续生产的窑址呢？

李炳炎先生是潮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喜欢收藏古陶瓷。出于对家乡文物的热爱，又偏好宋代笔架山窑瓷器。积年累月，所得渐多。收藏既多，进而研究，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心得，能够讲出许多理论来，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会员。他决定对



近年来的收藏和研究做一个小结，出一本《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也给中国古代陶瓷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贵的资料。炳炎先生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出于对他这种奉献精神

的钦敬，我不敢推辞，就把自己对笔架山窑的认识写下来，权充序言。

2004年元月，于笔架山下二玉兰斋

- 1、饶宗颐：《潮瓷说略》，原载《陶说》，东京：日本陶瓷协会，1955年。此据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P48。
- 2、到1957年，陶瓷专家陈万里发表《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也未曾提及饶宗颐的这篇文章。
- 3、《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 4、饶宗颐：《潮州宋瓷小记》，原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此据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P57。
- 5、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P47-56，《潮瓷说略》。
- 6、同注5。
- 7、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此据陈明编：《潮汕考古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P242-250。
- 8、饶宗颐：《潮州出土文物小记》“3、桃坑刘氏与笔架山

- 窑”，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P73-74。
- 9、这个报告又以《笔架山7至9号窑发掘与收获》为题，1983年在《汕头文物》（内刊）第9期发表，并被收进陈明编：《潮汕考古文集》中。
- 10、1986年《汕头文物》（内刊）第12期，有周继生《省考古队在潮州发掘北宋古窑》的报道。又，潮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有《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十号窑简介》。
- 11、参考黄挺等：《潮州古代商贸港口研究》，《潮学研究》（1），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P55-56。
- 12、羊皮岗佛像使用青花料描点的说法，先是罗原觉《谈瓷别录》提出，饶宗颐《潮瓷说略》、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都沿用这种说法。《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则认为是使用笔架山窑常见的酱褐色釉。
- 13、李辉柄：《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5期。



潮州宋瓷小记

饶宗颐

谈中国陶瓷史者，每称及“广窑”，大抵指阳江所制而言。阳江窑起於南宋，至明时徙南海县石湾村。旧时所谓“广窑”，无异以阳江为代表，然广东东部与江西、福建接壤之韩江流域，设窑烧瓷，为时极早，惜乎言瓷史者多未之及。惟程哲《窑器说》云：“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器类。”

（《美术丛书》初集第三辑）寥寥数语，无关重要。程氏书盖止论明瓷，於宋代潮窑产品，尚无所知。自一九二二年於潮安城西南羊鼻冈发现治平、熙宁时制水东瓷佛，上有款书“潮州水东”及“匠人周明”姓名字样，潮窑始为人所乐称道。水东佛像四尊，故友罗原觉著《谈瓷别录》特记其形制，以彰其事，文载《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余以州人，且曾撰《韩山志》，韩山即水东窑所在地，故於潮窑原委，向略究心，薄有记录，一九五五年夏旅东京时，为小山富士夫教授取去，由长谷部乐尔译为日文，载于陶瓷协会出版之《陶说》二四，该文屡见学人征引。近二十余年，考古工作之蓬勃，对潮瓷发掘益多，兹就所能记忆者，参以新知，以明潮窑之历史背景，撰为小记，藉供谈宋瓷者之采览焉。

一、窑址之发现

韩山去潮州城东一里，一名笔架山，以唐时潮州刺史韩愈曾登览得名。韩山迤东北三里一带山地，

产瓷土极丰，其地露出流纹岩层中，长石成份特富，伴生之石英，又每结集成簇；其岩石经风化后，石英易於析出，由长石变化之纯洁瓷土，采掘淘洗，极为方便。故自唐、宋时，已有开采，如黄金塘、康厝山、白岭、猴伯岭，及飞天燕之瓷土，皆有名于时，至今犹有人采掘，为烧瓷之用。北宋窑址即在此一带地区。故老相传，自韩山前山仔垵村至山后，宋时有窑九十九，窑长二丈八尺五寸，夙有“百窑村”之目，潮州城厢附近，居民每于其地掘得碗罐之类。西人斐得（Malcolm F. Ferly），曾调查福建、广东古窑址，亲至笔架山采集瓷片，所得甚夥，著有《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载《亚细亚杂志》（一九四〇年），称其平生在中国所见之古代窑址，以笔架山窑址为最大，残片遍布几及一英里而外，河边积土十余尺均与陶片结合。一九五四年三月，因韩山学校建筑校舍，发现宋代窑址。经勘查结果，据称“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涵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属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1.50公尺，砖破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粘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遗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

（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曩者，余於《韩山志》与《潮州志》二书中，



尝考查瓷土之产地及窑址所在之村落。瓷土除笔架山极为佳良之外，大埔高陂一带，距韩江之东岸约十里亦产瓷土；其中以山坪、雷公坪之土质最良，故高陂制陶业异常发达。其他产地，尚有丰顺之横居山阳坑墟、饶平之九村，而惠来梅林之陶土，向亦负盛名。潮州窑址之分布甚广，而乡村之名称亦冠以陶窑之文字者亦夥，例如：

潮安县 百窑村（即水东窑）

南窑村（现在竹蛭，离县城六里，在意溪西南）。其他桑浦山间，昔时亦有瓷窑云。

饶平县 砌窑村（宋代属於海阳县太平乡，后为宣化都大港之瓷窑村）。

澄海县 陶峯村（县北三十里处）。

丰顺县 峯前寨（距县城七十里处）。

惠来县 北溪窑山（县志载称：在县西北六十里，山名员墩，临一小洞，庵美角乡人，搭茅屋水碓，春泥陶碗，备乡邑器用。）

大埔县 窑子里（南接大麻）

青碗窑（西连黄坑村，为高陂、同仁两区交通之要地。）

碗窑溪（区署南边约十里）

窑脊村（溪口附近）

碗窑村（余粮坑附近）

近年发现之古窑址，大抵即在上述区域之潮安县境。

二 窑名之考证

水东北宋瓷佛像座，四围有铭文。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像云：“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娘，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造，匠人周明。”共六十三字。又熙宁三像文字略同。“水东中窑甲”一名，颇值得研究。“水东”即指韩山一带之地。韩山在

潮州城东，宋时人又名东山（见王象之《舆地纪胜》），以靠韩江东岸，故名“水东”。余曾于韩山麓废关帝庙内，发现清顺治间潮镇总兵郝尚久所立庙碑，题额曰：“溪东关帝庙碑记。”清初碑记称“溪东”，与此北宋佛像称“水东”，正相符合。“中窑甲”者，考韩山后临韩江滨一带村落，北宋时有“白瓷窑”之名。潮州城内开元寺有“潮州静乐禅院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铜钟，其上款识舍钱人姓名，中有一行云：

白瓷窑住弟子刘满、王长、慎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

政和为徽宗年号，后于治平。其地名曰“白瓷窑”，即因窑址所在而取名。《永乐大典》潮字号引元《三阳志》：“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明黄佐《广东通志》记庄典墓在韩山东白瓷窑，郭大鲲墓在郡城笔架山白瓷窑。庄典墓址在今韩山后，近黄金塘。合此三条，可知宋、明时所称之“白瓷窑”，正当今窑址发见之处，以其擅制白瓷，故以此为名；后人讹白为百，遂有“百窑村”之称。（近日发见窑址共数十处，余以为百窑村之“百”字，仍是约辞。）嘉靖郭春震修《潮州志》谓：“海阳县东厢统五村：曰东津、水南、南窑、仙田、恶溪。”光绪《海阳县志》有地名“南窑村”，谓“即今竹蛭，距城六里之濶溪西南处”。观最近查勘宋代窑址，在笔架山至濶溪塔山麓四五里之地，竹蛭正近濶溪，旧称“南窑村”，以证“中窑甲”之名，则宋时可能就窑区所在，以划分中部及四方各村落，故有“中窑”、“南窑”之称；至“白瓷村”则为其总称也。於此可见宋代潮州窑址之广，及瓷业发达之程度矣。

三 潮窑之衰落

潮窑盛於宋，周明所造佛像，技巧之精，即其明征。惟入元以后颇衰落，制作亦大不如前。最大原因，以予推测：宋时潮窑集中于笔架山，为取瓷



土便利之故。笔架山地带，当宋时，许氏、刘氏两盛族住居于此，有“山前许、山后刘”之目。许氏之先，自泉州迁潮。有许申者，大中祥符初，举贤良，仕至广东转运使。孙开义，官明州观察使，广南西路兵马都监。曾孙珏，娶太宗曾孙女德安县主，一门鼎盛。山后刘氏居桃坑及东津，至今尚为巨族。刘氏之先，有曰嵩者，自唐末偕清海军节度使至广州；子颖，移居於潮。其后有曰允者，登绍圣四年（一〇九七）进士，历知化州、桂州。允子昉、景。昉官荆湖南路转运副使，直龙图阁。景知台州、南雄二州。昉子四人，景子九人，皆显仕。造佛像之刘扶，其父名刘用，其子名刘育，泐钟之刘满，皆住百窑村，当系其族人。许、刘二氏俱宋时潮州巨室，当元兵来潮，韩山前后，颇遭蹂躏，居民星散（抄本《韩山许氏族谱》载其事甚详）。水东瓷业，或因此而中落欤？

四 潮窑在瓷史上之地位

北宋瓷器有长文者不多，其备记窑名、制造年月、供奉人及塑像匠工姓名者尤少。如此治平、熙宁佛像，实为仅见。（瓷器上刻划年月文字及匠者姓名者，晋器有之。见《程史》“晋益杆”条，惟不记窑名。瓷器铭文最长如余姚唐大中四年瓷壶，有铭四十三字。）

潮窑出品，有北宋英宗治平四年时物，后于江西景德镇瓷仅六十余年。（景德—〇〇四—一〇〇七）胎质莹白，釉作卵青色，色制介于定窑与景德窑之间，已如是精致，则其设窑可能更早。前潘氏抱残室藏瓷杯，牙白色釉，杯身锥拱花卉，杯内有底款：“宣和内府”四字篆字，据谓系潮州出品。（有图：见《广东文物》二辑。）如是，则潮窑

在当时亦为进御之物。一九五四年，潮安北郊发现两窑址，有青黄釉碗及莲花纹圆瓦当，共三十二件，与西安大明宫所出圆瓦当相同，故可定为唐代之物。（《考古》一九六四年第四期）又刘景墓经於一九五八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加以发掘，随葬品有影青缠青花白胎青釉瓷碗，为宋潮州窑之典型制作，又圆形盖面作墨书“五谷龙”三字之陶盒，素面无花纹，胎色灰白而不上釉，火候极高。（图见《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九期。）小山富士夫引仁和寺本《唐本草》“白瓷屑……广州良，余皆不如”句，至欲改广州为“潮州”，（《中国陶瓷》上，第三十六页）以潮州之白瓷，在北宋时已有其极高之成就故也。笔架山之瓷片，亦有雕刻莲瓣之碎片，陈万里亲临其地考察，加以仔细分析，认为瓷片种类虽有青釉、黄釉等，但以白釉及影青二者为主，水东窑之产品，大致如此。（《文参》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潮瓷最引起人之兴趣者，为近宋龙泉型之双鱼瓷碟，一般已目为潮安产品。屈志仁近日在中大举办之东南亚贸易瓷研讨会中宣读论文，亦提出龙泉与潮瓷有密切关系之见解。以予所知，此类双鱼青瓷碟，一九五六年曾在长沙发现，（图见《文参》一九五六年第八期）与此完全一样。据称在湘南桂阳於一九五五年曾出有二十余件，如是湖南此一批龙泉双鱼碟，可能来自潮州。（南宋初，潮州水东人刘昉官潭州安抚使，必带有潮人来湘。）惟查龙泉县金村出土之南宋龙泉青瓷中亦有双鱼洗，（见



水缸山及桃坑湖



朱伯谦等《龙泉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图十二）则此类瓷碟，自应属于南宋。潮安城南洪厝埠出有梅子青双鱼碗碎片，究在何代？其划有皇祐及治平年号之压锤，出土地点乃在城北郊竹竿山古窑址。洪厝埠则在城南，其地原为南山寺，据嘉靖潮志：“南山寺即广法寺，在南厢一里，洪武间建。”（陈万里谓南山寺建于宋绍兴，未详所本。）则洪厝埠之遗物，恐难及於北宋，潮之双鱼碟，与浙江龙泉，孰先孰后？仍待研究。潮州梅子青间有开片之冰纹，观治平四年九月

佛像，冰冻开片，微近哥窑，则此种开片技巧，北宋时水东窑工，已惯用之。

唐代青釉凤头壶残片，据冯先铭云：近年於潮州韩山及广州西村窑址，屡有发现，凤头壶为吸收波斯作风之制作，泉州海上贸易，唐宋甚盛，故广东潮州亦有发现。（《文参》一九五八年第二期）此类凤头壶如果为本地产品，台北郊发见之莲花纹圆瓦当二事论之，唐代潮州瓷器与外地最少已有相当交往，瓷业发轫甚早，故北宋中期，水东窑制作遂有此成就，非偶然也。

（原载《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

附：桃坑刘氏与笔架山窑（摘自《潮州出土文物小识》）

广东潮州宋墓有纪年者以一九五八年发掘乾道八年之刘景墓最受人注目，彭如策有文记之（见《考古》一九六三年九期）。曾广亿《陶瓷》一长文引《广东通志》卷六十三称：“刘景为广东潮阳县人”。按景乃刘允之子。嘉靖《潮州志》七《人物志》：“刘允字厚中，海阳人。子昉，龙图阁学士；景，举贤良方正。孙汶、渭、滋、渔、少集，皆绳绳继美”。吴颖顺治《潮志》，科名部：

“海阳刘允，默子，绍圣四年第三甲。

海阳刘昉，允子，宣和六年第三甲……。

海阳刘少集，昉孙，乾道八年第四甲……”。

往年曾见抄本《桃坑刘氏族谱》：“刘景，海阳人，赐爵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刘渔，景次子，荫官食邑三百户”。昉与景俱为刘允之子。《夷坚志》卷十四“开源宫主”条记其事云：“刘允，潮州海阳人。…（临绝前）呼二子昉、景。……潮人陈安国尝叙其事。昉后更名旦，……知潭州，景尝知台州。”又同书卢陵人张敦梦医条，记其侨寓潮州，与提举刘景事。据上诸记载，刘景为刘允之子，当是海阳人。宋初潮州领海阳、潮阳二县。《宋史·地理志》：“宣和三年，新置揭阳县，绍兴二年，省揭阳潮阳并入海阳”。故刘景当为海阳人。作潮阳者非是。据《刘氏族谱》，刘氏族居韩山（笔架山）后之东湖，其地方称桃坑，刘氏蔚为盛族。允子昉、景，昉子四人，景子九人，皆一时显仕。

潮窑所以集中於笔架山，以其附近白岭出产瓷土之故，北宋有治平四年（一〇六七）款佛像铭云：“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为父刘用……造，匠人周明。”潮州城内开元寺之“静乐禅院”政和四年（一一一四）钟款云“白瓷窑住弟子刘满……舍钱……祈平安。”白瓷窑为地名，在笔架山，刘扶、刘满疑皆刘允、刘景之族人，笔架山窑所在地，为桃坑刘氏聚族之区，故有刘姓多人制造供养。倘以刘景作潮阳人看待，则显违事实。惜《桃坑刘氏族谱》抄本，经乱久佚不可复问，兹就记忆所及参以旧作《潮州宋瓷小记》补述於此。

（原载《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中大文物馆，1989年）



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分析研究

曾广亿

一、前言

潮州是广东东部地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广东生产陶瓷的重要区域。潮州早在北宋时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瓷都，瓷窑遍布在东南西北四郊一带，方圆断续约15公里。其中笔架山窑址瓷窑最为密集，有“百窑村”之称。窑具和瓷片遍地皆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郊区有很多民房的围墙和墙基均用宋窑中的匣钵和废瓷砌叠而成，当年的瓷业盛况可以想见。解放前，国民党军阀混战，在西郊挖战壕时，挖出大批完整的精美宋瓷（包括不少刻有宋代年款的瓷器）可是没有进行整理研究，有的被国民党军阀卖给古董商，后来辗转被贩出国，或贩卖到港澳地区¹，有的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至今已湮没无闻。过去的地方志没有潮州唐宋时期制造陶瓷的记载，过去的谈瓷者亦毫无根据地囿于传统的偏见，认为潮州陶瓷是不值得重视的粗器。我们认为潮州陶瓷，特别是潮州笔架山的北宋瓷窑，在制瓷技术和制瓷工艺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1981年广东省博物馆根据过去在笔架山发掘的六座宋代残窑进行资料整理，并编写成《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一书，在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²，笔者认为出书是一件好事，但有限的资料，它远远未能反映出潮州宋瓷工艺的真实面貌，这应

该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美中不足）。最近潮州市东大电器有限公司经理李炳炎先生（潮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收藏家协会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专程到广州告诉我一件好消息，说他多年来在潮州民间收藏了一批完整的笔架山宋代瓷器（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精品），他准备最近要出一本《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书。图片实物来源除他本人的藏品之外，还有潮州市博物馆历次发掘的实物和民间收藏家收藏的完整器物 and 近年韩江抽沙打捞的笔架山窑瓷器。这些实物图片，全部都由他本人按器形分类作了详细的描述。李炳炎先生还告诉我，出书后他希望把他笔架山窑的一些藏品提供给潮州宋代笔架山窑博物馆展览。又说香港饶宗颐老教授已帮他写好了书的封面题签，并欣然同意将他早年的著作《潮州宋瓷小记》编入该书。韩山师院潮学研究所所长黄挺教授也为该书写了“序”，并希望我写一篇《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分析研究》的文章。我虽然年老体弱、多病缠身，但由于李炳炎先生热爱家乡文物，热爱祖国文化遗产，他虽然是一个业余文物爱好者，但为了宣传和保护好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补充过去“报告”中的不足，多年来他不辞劳苦，在收藏笔架山窑的精品中废寝忘餐，既出钱又出力，可以说在茫茫的人海中，他每收藏一件精品



都付出了很多艰辛的汗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他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丰硕成果，连同他人和单位提供的精品图版，整理成书，公开出版，这对文物保护和对文博事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种新时代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人钦佩！值得弘扬！因此，我欣然答应了李先生对我的要求。文章应该怎么写呢？建国以来，潮州笔架山共发掘了十座宋代瓷窑，所以本文主要是依据过去已发表过的材料，再作一次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以供读者对宋代笔架山瓷窑有个概括性的认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二、瓷窑的地理位置与历次发掘时间

笔架山位于广东潮州市之东，和市区仅一水之隔。笔架山又名韩山或双旌山³，山脉沿韩江东岸自北而南蜿蜒起伏，山脉的中部有三峰高耸并峙，形似笔架。笔架山范围很大，南北长约三公里，在面临韩江的西面山坡和山脚，遍地都是窑址里暴露出来的匣钵和瓷片，由于窑灶群集，早在北宋已有“水东窑”和“白瓷窑”之称⁴。由于民间传说笔架山宋代有瓷窑九十九条，故山脚沿江一带的村落，亦被称作“百窑村”。笔架山有许多小山名，其中包括猪头山、虎山、果子厂后山、印山、蟹山和庄厝山等。

1953年，潮州韩山师范附小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西面山坡修建校舍，发现了四座长条形斜坡式龙窑，出土了许多窑具和瓷片，省文管会区昭文对现场作了调查，采集了一批标本。1954年12月广东省文管会曾广亿、广州市博物馆陈宏兴、潮安县文化馆柯鸿才等人对笔架山窑址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采集标本，并配合引韩灌溉工程在北郊北堤头发掘了一座唐代馒头窑⁵。

1958年省博物馆配合笔架山基建工程的施工，在北段的猪头山和南段的印山先后两次清理了三座窑室，编号为一、二、三号窑。当时由原广东省文

物考古队长区家发同志主持这项工作。

197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广东省文化局举办的省考古训练班到潮安县潮城镇进行考古实习，在笔架山中部的果子厂后山清理了三座已被毁坏的瓷窑，编号为四、五、六号窑。参加这次发掘清理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专业人员曾广亿、梁明荣、何纪生、邱立诚、杨少祥、黄玉质等人和来自省内八个地区、四十八个县、市的六十一名学员。这次田野实习得到了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和枫溪陶瓷公司的大力支持。

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潮州市文化局为了配合潮安韩山师范专科学校基建工程的建设，又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山坡清理了三座瓷窑，编号为七、八、九号窑。参加这次发掘清理工作的有黄玉质、杨少祥、唐嘉卫和张绍万同志⁶。

1986年1月，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与潮州市博物馆在笔架山中部的庄厝山，又发掘清理了一座瓷窑，残长79.5米，编号为十号窑。这座古窑的长度，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国内均极罕见。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当即拨款兴建围墙等对十号窑进行保护。由于笔架山宋代窑址对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和对外贸易发展史均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1962年被广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⁷。

三、瓷窑结构和地层堆积情况

一号窑 长条形斜坡，分六级。依山势建筑，斜坡度为 17° ，窑室方向 292° 。全长30.28米，分窑门、火膛、窑床和烟道四个部分。从发掘出的遗迹看，建窑时先在山坡上挖一条长形斜坡深沟，两侧用砖砌墙，火膛和烟道砌双隔墙，窑床为单隔。窑顶全部塌毁，原貌不明，窑壁残高0.06~2.12米，按窑后壁弧度复原，窑室高度约在2.8米上下。

窑址可分八段。第1段是凸字形的火膛，前墙正中是窑门。宽1.6米。火膛长2.85米，宽2.56~4米。



火膛左壁墙基被现代墓破坏，窑门外铺四块长条形大麻石板，可能是当年窑门前的地板。第二段至第七段是窑床，共分五级，各段长宽和坡度不尽相同。第二段右壁窑基部分受破坏，左壁中部设一门，宽1.5米，原高不明。第三段左壁中部也有一门，宽与前同。这两个门是装胚和出窑时使用的，烧窑时则用砖临时封闭。第八段是烟道，前壁设烟门三个，正视作半椭圆形。左右烟门高约1.32米，宽63~70厘米，中间烟门高1.78米，宽0.4米。烟门下部横放6块砖，无疑是调节烟门大小的活墙。烟门后是烟道，深约1.06米，高度不明，最后是窑的后壁。窑床的第1段和第2段较长，第3~6段较短。窑底全部用黄褐色土夯打而成。

窑室的堆积可分三层。上层是灰褐色表土层，平均厚约0.15米，内含少量青釉瓷片和残破钵匣。第二层是遗物堆积层，厚约0.88~2.6米，内含大量匣钵、渣饼、垫环和白釉、青白釉、青釉、黄釉等各种瓷片，器形有碗、盏、杯、壶和窑顶塌砖等。第三层是窑底铺沙层，厚0.05~0.12米，内含少量木炭末和小块烧土，这层沙的作用，是器坯入窑时用来承垫窑底匣钵，以便在斜坡上平稳地叠置器物的。第3、4和第5段窑室内的遗物最丰富，与匣钵粘在一起的瓷器几乎占满了大部分的层位，匣钵排列整齐，好似刚入窑时一般。由于瓷器粘在匣钵里面，极难取得完整的器物。第2段窑室的产品以大型碗、壶为主，第3、4段窑室则以盏、杯为主。这么多的匣钵和瓷器留在窑床里，很可能是停烧时留下来的。

在火膛和窑门外，遗留有大量木炭末和草木灰层，表明当年使用的燃料主要是草木。

二号窑形制与一号窑相同。亦坐东向西。窑室已很残破，火膛和窑门全部被毁，原貌不详。残存的前段窑室亦被宽2米多的壕沟毁去大半，第2段则被近代墓打破，第3段保留较好，但券顶已塌，残存砖墙0.06~0.45米。窑的后半部也全部被毁，全

长不明。残存的三段总长17.70米，第1段长10.70米，宽度不明，第2段长5.18米，宽2.16米，第3段长1.82米，宽2.64米。窑的两壁都是平砖顺砌，左壁砌双隅墙，因墙外的山坡是由碎匣钵和瓷片堆积而成，墙壁极易倒塌，右壁则只砌单隅砖墙。

窑室的堆积可分三层。上层是灰褐色表土层，厚0.05~0.11米，内含少量破碎匣钵和瓷片。第二层是遗物堆积层，残存的前两窑室里清理出一百多件完整的匣钵和大量瓷片，以白釉和青釉为多，其次是青白釉、黄釉和酱褐色釉。器形有碗、盏、钵、盘、碟、瓶、壶、罐、盂等。第三层是窑底铺沙层，厚0.05~0.11米，内含少量炭渣、垫环、碎瓷片和小块烧土等。再下面就是经过夯打的窑底。

三号窑亦是长条形，斜坡上有台阶。依山势建筑，斜坡度为 14° ，方向 161° 。窑室用单砖平放顺砌，窑底用黄褐色沙土夯打而成。窑壁残存高度从一块平放砖（5厘米）至3.12米左右，券顶全部塌毁，从后壁的砖墙观察，窑室高达3.16米。

火膛和窑门尽毁。窑室残长65.5米，有16段，第1~15段为台阶形窑床，第16段为烟道，各段窑床的长宽和坡度不尽相同。在第1段窑床紧靠右壁的底部，有一条长12.74、宽0.16、深0.07米凹槽伸出壁外，可能是一条排水沟。烟道的前壁砌双隅，开烟门12个，各高0.6米、宽0.2~0.32米。门后烟道的高度约在3.2米上下。此窑第一段窑床较长，其余各段都较短，第15段平面的坡度也很小，几乎接近水平，这些都和一号窑不大相同。

窑内堆积分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第二层是遗物堆积层，内含大量匣钵、渣饼、垫环和各种釉色的瓷片及瓷器，器形很多，笔架山常见的各种器形几乎都有发现，说明该窑的产品比较繁杂。第三层是铺沙层。

四号窑阶级窑。依山势建筑，坐东向西，窑床斜坡度为 17° ，方向 290° 。窑门、火膛、烟道



因破坏严重，原貌不明。两侧窑壁用砖平放顺砌，残高0.05~1.8米，券顶塌毁，高度不明，除第7段窑室砌双隅砖墙外，其余各段两侧窑壁均砌单隅。窑底是用黄褐色沙土混合着少量破碎匣钵和瓷片夯打而成。

窑室残长31.76米，分7段。现存第1、3、5、7段是装烧瓷器的窑床，第2、4、6段是燃烧室，燃烧室的横隔墙砌单隅砖，第6段前后隔墙则插进少量完整匣钵，墙的上部已受破坏，下端有一排出火孔。在前两间燃烧室的右壁中部各保留有一个高0.16~0.18米，宽0.16~0.18米的气孔。窑的最后有一段长0.6米、宽2.72米、高2.28米的砖墙残迹，当是烟道位置，由于受现代墓的破坏，原貌不明。从砖墙残迹后面观察，此窑原来的长度是往上继续延伸。

第3、第7两段窑床的两壁砖墙向内倾斜较大，可能是由于长期的高温作用所致。第7段现存的双隅窑壁，每一层砖墙的内侧面都粘附着一层厚的墨绿色琉璃，表明这里是前后两期的窑壁，起初是单隅墙，后来为了加固或者为了缩窄窑室，在内侧加砌一单隅墙，成为现存的双隅窑壁。从窑底的剖面观察，窑底也有前后期之分；因所出瓷器特征没有明显变化，很可能是在不长的时间内调整窑底所致。

窑室的堆积分为三层。上层是表土层，平均厚度约13厘米。第三层是遗物堆积层，厚0.32~1.88米，内含大量破碎匣钵、渣饼、垫环和各种釉色的瓷器、瓷片，器形有碗、盏、盆、盘、碟、杯、灯、炉、瓶、壶、罐、孟、粉盒和器盖等。下层是窑底，铺一层厚0.06米左右的粗砂，夹杂有少量匣钵和瓷器碎片。

五号窑 平面作长条形斜坡式，依山势建筑，坡度14°，方向286°。窑门、火膛和烟道部分均已破坏，原貌不明。窑两壁用单砖平放顺砌，券顶已塌，砖墙残高0.15~1.09米。窑底是黄沙土，经过夯

打。

窑室残长27.85米，从前端14米~22米处，各保存有用匣钵和砖砌的磺墙残基一条。窑室各段的长、宽均不一致。窑床的中部被一座明墓打破，但深度未及窑底；窑床的后部又被一座宋墓打破，穿过窑底。

窑室堆积可分三层。上层是淡灰色表土层，平均厚度约10厘米。第二层是黄灰色的松土遗物堆积层，平均厚度约1.2米，内含大量窑顶塌砖、匣钵、瓷器及瓷片。各种釉色的瓷器都有，但完整无缺者不多，可辨认的器形有碗、盏、钵、盘、碟、杯、炉、瓶、壶、罐、粉盒、器盖和人像残件等。在中部位置还出土了“元丰通宝”铜钱一枚。第三层是黄灰色的铺沙底，平均厚度约0.07米，靠窑壁的粗沙多与壁面墨绿色的釉块粘连在一起。

打破窑床后部的一座宋墓，长2.44米、宽1.12米、高0.7米。四壁用四方形灰砖和长方形窑砖砌叠，墓顶用四条长方形石块复盖。随葬品仅见铜钱一种，能辨认钱文的有18枚，计“开元通宝”3枚和15枚北宋铜钱，只有少数因腐朽太甚未能辨认钱文的。墓室使用了一些本窑窑砖，砖上粘满墨绿色琉璃。肯定该墓是建于所在窑灶废弃以后。这对于研究窑灶的下限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六号窑 长条形，依山势建筑，总斜坡度约19°，方向275°。窑身在长期山水冲刷中出现了几条水沟，位处山脚的窑门和火膛全部被毁。从露出地表的两侧窑壁测量，残长约30米上下。由于考古训练班实习时间所限，此窑未作全面清理，只在窑床内断续开了四条探沟，由前端往后计算，编号为T1、T2、T3、T4，在T4的后面没有窑砖暴露出地表，烟道的位置没有探掘，情况不明。

T1 长1.48米，宽2.61米，即窑床宽度。窑壁用灰黄色砖平放顺砌，双隅。窑室堆积的上层是表土层，第二层是遗物堆积层，第三层是窑底铺沙层，第四层是黄褐色砂土夹杂少量青釉瓷片和匣钵碎片

